

##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2002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秀蘭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J.P.

李卓人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李華明議員，J.P.

呂明華議員，J.P.

吳亮星議員，J.P.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許長青議員，J.P.

陳婉嫻議員，J.P.

陳智思議員，J.P.

陳鑑林議員，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單仲偕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黃容根議員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J.P.

楊森議員

楊耀忠議員，B.B.S.

劉江華議員

劉皇發議員，G.B.S., J.P.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J.P.

鄭家富議員

司徒華議員

霍震霆議員，S.B.S., J.P.

羅致光議員，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鄧兆棠議員，J.P.

李鳳英議員，J.P.

胡經昌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J.P.

麥國風議員

陳偉業議員

梁富華議員，M.H., J.P.

勞永樂議員

黃成智議員

葉國謙議員，J.P.

劉炳章議員

余若薇議員，S.C., J.P.

馬逢國議員，J.P.

### 缺席議員：

朱幼麟議員，J.P.

李柱銘議員，S.C., J.P.

吳靄儀議員

陳國強議員

梁耀忠議員

黃宜弘議員

劉千石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石禮謙議員，J.P.

馮檢基議員

## 出席政府官員：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 列席秘書：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 議員議案

**主席：**第二項議案：貿易政策。

### 貿易政策

**陳智思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議程內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

這項議案也許稍不尋常，一來沒有向政府諸多要求；二來涉及國際事務，與本港問題無關。簡單來說，這項議案要求政府在有機會時，挺身而出，反對富裕國家那些會傷害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

整體來說，已發展國家的經濟較發展中國家趨於開放。談及自由貿易，我們每每會聯想到富裕的西方國家。這些國家經常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鼓勵發展中國家開放經濟。可是，這些言論的背後卻隱藏着不少偽善，國際貿易的舞台上充斥了一些名副其實的雙重標準。大部分已發展國家——肯定包括美國、歐洲聯盟及日本——特別針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最蓬勃行業來設置貿易障礙。

以中國為例，汽車擋風玻璃、鋼材、單車零件、電視顯象管、傳真機、蒜頭、人蔘及菌類等形形色色的產品，均須按所謂反傾銷的規定繳付額外關稅。雖然這些規定理論上是要確保公平競爭，但是，特別在美國及歐洲，這些國家經常以不公平的方法，利用這些規定來達到保護本土生產商這單一目的。

其他發展中國家則遇到不同種類的障礙。舉例來說，巴基斯坦及印度精於製造床上用品及毛巾，但多年來，一如很多其他低成本紡織品製造商，只要超逾配額，便得被迫繳付關稅。

澳洲以水果可能帶病或經有害化學品處理為理由，禁止菲律賓某些新鮮水果進口。可是，其他富裕國家卻樂意購買菲律賓水果，分別在於那些國家跟澳洲不同，不用保護本土的香蕉及菠蘿生產商。

也許在富裕國家所架設的貿易障礙中，破壞力最強要算農業補貼。已發展國家每年的農業補貼為 3,500 億美元，相等於對外援助金額的七倍。這些補貼令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根本無法競爭。舉例來說，美國納稅人補貼當地棉花生產商每年高達 20 億美元，較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棉花產量的總值還要高。

這對貧窮小國如西非布吉納法索的人民無疑是一大打擊，因為棉花佔該國一半出口量。按照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的估計，如果布吉納法索的棉花生產商能在公平條件下競爭，該國的貧民可在 6 年內減少 50%。

美國最近通過的農業法案，將會令全球的農產品價格銳降。泰國生產稻米的成本較美國少一半有多；但加上補貼後，美國稻米在出口市場的價格卻遠較泰國稻米為低。泰國必須給予同樣補貼，才可以令農民繼續賴此為生。

從種種個案可見，發展中國家較貧窮的人往往是這種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

眾所周知，發展中國家本身也設有貿易障礙，而缺乏經濟自由令那些國家的經濟停滯不前。在很多情況下，那些國家之所以貧窮，主要是政府拙劣，貪污成風。因此，把貧窮國家的所有問題歸咎於已發展國家，並不公平。但是，這並非關鍵之處。較富裕國家理應盡力為第三世界減貧。開放市場予發展中國家，是扶貧解困的最有效方法，較推行對外援助計劃更有用處。

我們也不要忘記，已發展國家設置這些貿易障礙，不單止會傷害產品國家的人民，還會令富裕國家的消費者較少選擇，貨品價格較高。政府提供補貼，亦即表示他們須繳付較多稅款。長遠來說，這些貿易障礙對所有人都會造成傷害；這些貿易政策更會令全球走向貧窮。這樣一定會衍生政局動盪、偷渡、犯毒及其他問題。

也許現在有人會問，我們為何在香港立法會聽到這些問題呢？為何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挺身而出，反對富裕國家向等三世界的出口採取保護主義？

首先，我們在道德上佔了上風。美國傳統基金會及美國卡托研究所定期公布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系。我們奉行全面開放的自由貿易，是世界上少數這類經濟體系之一。為何我們不宣揚這信息？事實上，我們的官員確有經常宣揚這信息。他們出席貿易談判時，會支持自由貿易。當他們演說或接受媒介訪問時，會叫人留意這點，而我們的政府部門也經常在刊物及網上提及本港的自由貿易特質。我希望他們做的是，憑藉這些機會，倡議廢除那些由富裕國家所架設、令發展中國家貧困加劇的貿易障礙。

第二，吾道不孤，各色各樣的團體都為這問題挺身而出，包括各慈善機關及志願團體如樂施會；跨國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自由市場智囊機構如美國卡托研究所及美國傳統基金會。此外，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主管石廣生先生經常毫無保留地批評不公平運用反傾銷措施的手法。因此，特區政府這樣做也許會令中央另眼相看。

第三，這樣做不花成本，而且可能有助提升我們的國際聲譽。我們在捍衛自由貿易時，更可為我們的理據加入道德及經濟等原則。

唐英年先生新任處理貿易事務的主要官員，也許至為合適。以他所具的紡織業背景，他必定熟知種種由配額、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所造成的困難。

有人可能會說，好吧，但特區政府能否扭轉乾坤呢？我可能是本會最年輕的議員，但可不是最幼稚的。特區政府對其他國家的貿易政策當然影響力甚微，甚至是全無影響力。

美國最近通過的農業法案訂定，在 10 年內，會向美國的農產業提供 1,800 億美元的額外補貼，實際的金額可能更多。雖然布殊總統發表不少支持自由貿易的言論，但他與歐洲及日本的領袖無異，同樣熱衷贏取農民的選票。

特區必然無法說服已發展國家的領袖為了幫助第三世界而輸掉農業地區的競選，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可以與慈善機關、國際團體、知識分子及智囊機構聯手挺身而出。樂施會數月前就這問題發表了一份報告，指出歐洲聯盟是對發展中國家造成最大損害的已發展經濟體系。這份報告顯然正中要害，因為反應頗為強烈。歐洲的選民自覺是西方世界願意關懷別人的一羣。因此，是值得挺身而出的。人們是會傾聽的。如果不斷有人指出已發展國家實行保護主義的代價，較富裕國家的選民可能會感到羞愧，因而向政府施加壓力。

自由貿易對中國有利。一項估計顯示，如果已發展國家全面開放入口市場，內地生產商的營業額每年將可增加 30 億美元。這對內地一些貧困的人及失業者會有幫助。這更可為本港與貿易有關的行業，以及到內地找尋機遇的本港投資者開拓商機。

亞洲其他地區也會受益。印尼每年可以多賺取超過 6 億美元。這將有助拓展印尼成為香港的市場。如果印尼能夠因經濟繁榮而令局勢更穩定，當地香港投資者的前景將會獲得改善。

第三世界國家如果能獲得較佳的貿易機會，最終可以紓緩貧窮問題，令全球局勢更趨穩定，更可減低人們對全球一體化的反對聲音。

香港是從自由貿易及全球一體化獲益的活證。正如我所說，我們較其他任何經濟體系更有資格談論這問題。我們的政府應出言支持為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

主席女士，我謹動議議案。

**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譯文）**

“本會促請政府在國際論壇上提出贊成自由貿易的理據時：

- （一） 支持廢除歐洲聯盟、美國及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系對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及紡織等行業的貧窮工人構成歧視的貿易手法；及
- （二） 強調開放市場對紓緩全球的貧窮及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性。”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李卓人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智思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主席，全球經濟一體化，可以說是人類世界在新世紀中最嚴峻的挑戰，直接影響全球每一個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往來雖然並非新事物，但隨着資訊科技和市場開放，其發展速度實在非常驚人。不過，正因為貿易發展極不平衡，造成人類社會極大危機。一體化為發達國家和跨國企業帶來無限商機，但當地工人卻要面對高失業或低收入的風險。貧窮國家的工人更慘被榨乾，部分甚至連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脅。難怪主催一體化的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世界銀行（“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基會”）都像“過街老鼠”般，到哪裏開會都有大規模示威，人人喊打。即使世銀總裁 James WOLFENSOHN 在 1999 年也要承認，在民眾的層次，整國制度是行不通的。讓我在以下跟大家詳細解釋。

以在世界盃揭幕戰以 1 比 0 擊敗上屆冠軍法國的塞內加爾為例，他們在近十多年的發展經驗，可以解釋到我提出修正案的主要理據。

塞內加爾位於非洲西部，在 1960 年 4 月 4 日正式脫離法國獨立，全國面積大約 20 萬平方公里，當中可耕地佔大約 12%；在 1999 年，當地人口約為 920 萬人，其中 47% 在城市居住。在 1986 年，塞內加爾開始實施國基會的結構調整措施，當中包括取消政府援助農民的計劃，並改為鼓勵出口農作物



的政策。正正因為政策有所轉變，使本來種植主要食糧，例如種植玉米和蔬菜的農民大受打擊，全國出現糧食危機。在 1990 年，當地有 33% 人口處於飢餓境況，兩年後，數字升至 40%。根據當地政府估計，在 1996 年，全國有 22% 的兒童長期營養不良。

在國基會主催的自由化調整政策下，塞內加爾的失業和童工問題都嚴重惡化。首都達卡的失業率由 1991 年的 25% 急升至 1996 年的 44%。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推算，在 2000 年，當地有超過四分之一 10 至 14 歲的兒童從事經濟活動。此外，為了促進出口競爭力，塞內加爾在 1994 年將當地貨幣西非法郎貶值，結果令入口貨品（包括藥物）的價格暴升一倍，導致連串罷工、騷亂。經過了十多年的自由化政策後，塞內加爾最終成為全球 49 個最低度發展國家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的其中一員。

很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有塞內加爾的類似經驗，自由貿易、開放市場，不單止沒有帶來美好的明天，反而令這些國家陷於貧窮深淵。為何經濟學教科書的預期跟現實有那麼大差別呢？發達國家的不公平貿易政策是其中一個原因。例如在七十年代，種植蕃茄曾經為塞內加爾帶來多元化耕種，既可幫助農民保育耕地，亦為他們提供額外收入。可是，自從在 1994 年放寬濃縮茄汁的入口限制後，包括塞內加爾在內的西非國家，根本無法跟擁有政府巨額補貼的歐盟產品競爭，結果導致他們的蕃茄種植和加工業全面萎縮。塞內加爾的濃縮茄汁產量，由 1990 年的 73 000 噸，下跌至 1997 年只有 2 萬噸。

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的研究指出，目前某些商品市場的結構和運作模式，令部分發展中國家即使有機會參與國際貿易，也不能分享貿易的好處。以咖啡為例，主要咖啡入口商為了維持穩定的供應，要求每個國家的年產量最少有 6 000 萬公斤，很多發展中國家由於以小農為主，或因為耕種技術落後，又或根本是可耕地嚴重不足，都難以達到這個要求。部分國家為了達到要求，結果只能集中於數種商業農作物，除了不利保育耕地外，亦令他們更受商品價格下跌或波動的影響。例如咖啡豆出口價格，自 1997 年至今已下跌接近七成，令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農民血本無歸。根據世銀的研究，當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投入農產品出口市場，亦會令價格下降的趨勢持續。目前的資料顯示，香蕉、可可、咖啡、茶葉和棉花市場，已經出現了這個趨勢。再加上近年商品市場跟金融市場進一步連繫，投機活動令商品價格一如金融市場般大幅波動，亦不利發展中國家的穩定發展。

主席，對於貧窮國家和貧窮人民來說，盲目的自由貿易是行不通的，於是不少工會和非政府組織便提出公平貿易的概念，支持廢除發達國家的不公

平貿易政策，令發展中國家可以進入他們的市場。這便是陳智思議員剛才在演辭中經常強調的所謂廢除一些不合理的貿易障礙。在這一方面，我和陳智思議員是沒有分歧的。我們最大的分歧是，除了要廢除不公平貿易政策外，同時亦要求世貿、世銀、國基會等，容許發展中國家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決定開放市場的範圍、程度和時間表。這可能便是我和陳智思議員最大的分歧。理論上，自由貿易應該是沒有任何形式的保護的，但我們覺得發展中國家須被保護，他們應發展自己的保護，而不是說他們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便不能保護自己，因為他們跟發達國家的情況很不相同。所以，我們希望容許發展中國家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決定開放市場的範圍、程度和時間表，而不是盲目地追求自由貿易。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過去 10 年，在消除貧窮方面表現最好的經濟體系，包括中國、泰國和越南，都並非實施最開放貿易政策的國家。

主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便好像大衛和哥利亞那樣，如果要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貿易改善人民生活，便必須有另一套適合他們的遊戲規則和標準，一如跑馬有加磅那樣，才可以有公平競爭，而並非用“一招了”套用於全世界。這亦是我們不能支持原議案的原因。

主席，促進貿易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我們不可以一味只談貿易而不談民生。所以，職工盟和世界各大工會，都要求加強國際勞工組織在制訂全球貿易政策上的參與和影響力，希望可以令貿易政策更照顧及勞工和民生的需要，而這一點亦是修正案的其中一項建議。

至於在貿易協議內加入保障基本勞工權利的條款，我明白這項議題極具爭議。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透過剝削勞工減低生產成本，構成不公平競爭，而發展中國家則認為這是發達國家實行保護主義的藉口。我先要指出，基本勞工權利包括 4 個主要範疇，即禁止強迫勞動、禁止僱用童工、消除就業方面的歧視，以及保障工會的組織權利，並非直接影響成本的勞工權益 (benefits)。讓我再強調，這不是與金錢有關，不是與工資有關。全球大部分國家都認同這 4 項基本勞工權利，部分發展中國家反對加入保障基本勞工權利的條款，主要理由是他們對世貿無信心，害怕會變為打擊他們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工具。

主席，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有見及此，多個主要國際工會組織，包括國際自由勞聯 (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要求國際勞工組織根據現有機制，處理有關違反基本勞工權利的投訴，而他們亦全力支持國際勞工組織繼續以對話和技術支援的形式，促進和推廣基本勞工權利。不過，對於一些最嚴重違反基本勞工權利的個案，好像

謀殺和拘禁工會領袖，或縱容兒童從事性工作，便應該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下，由世貿決定是否須作出制裁。

修正案的最後一項建議，便是希望政府先諮詢香港的關注團體，以便能評估所有向外的貿易政策對整體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 李卓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譯文）

“在“本會促請政府在”之後刪除“國際論壇上提出贊成自由貿易的理據”，並以“參與國際會議討論貿易政策和磋商貿易協議”代替；在“構成歧視的貿易手法；”之後刪除“及”；在“（二）強調”之後刪除“開放市場”，並以“公平貿易”代替；及在“對紓緩全球的貧窮及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性”之後加上“；（三）要求世界貿易組織加強與國際勞工組織的合作，並支持在貿易協議內加入保障基本勞工權利的條款；及（四）在出席該等會議前，透過公開聽證會或其他類似的方式，充分諮詢本港市民和關注團體”。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就陳智思議員的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港政策，對各類進出口貨物，基本上都不徵收任何關稅，亦沒有任何補貼本土工業的政策，令本港經濟在過往一段長時間，得以蓬勃發展。香港因此亦連番得到全球貿易最自由地區的稱號。我想這些都正正是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成立的宗旨，即要打破一切貿易壁壘，締造一個共創繁榮的新局面。所以，中國以至其他很多發展中國家，均樂於爭相成為“地球村”的一員。

不過，有些國家不顧世貿的原則和理念，仍或明或暗地實施貿易壁壘，例如對自己國家的昂貴產品進行補貼，令其他國家有效而成本低的產品受到打擊，干預自由貿易。部分則運用各種藉口，對輸出國徵收懲罰性關稅，令對方輸出的貨品成本上升。

舉例來說，自今年 3 月起，美國單方面對部分進口鋼鐵產品加徵高達 30% 的保護關稅，藉口便是輸出國採用了低價傾銷政策。美國紡織界亦同樣要求政府保護紡織業，例如以進口激增條款，限制每年進口紡織品的增幅。由於

中國及香港目前有超過五成紡織品出口到美國，美國業界的訴求一旦得到美國政府採納，將會對中港兩地的經濟造成難以補償的損失。當然，除了工業製品外，農業產品亦是一個紛爭甚多的貿易項目。

因此，工業總會和自由黨是支持中國政府，循着世貿設定的申訴渠道，就不公平貿易條款提出申訴，要求國際組織進行合理的仲裁，以便能堅持世貿提倡的自由和公平的貿易原則。

對於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想指出他的論點其實是有謬誤的。因為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和世界銀行在上月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中警告，保護主義危害全球經濟增長，貿易限制反而會令發展中國家的貧窮情況惡化，我們認為只有努力消除貿易障礙，貧窮國家才能擺脫貧困，藉生產力的提升和自由貿易的推行，增進本國的收入。然而，修正案的第三項要求提高勞工保障，例如增加工資及福利等，這與自由貿易政策本來屬於兩碼子事，根本不應混為一談。

問題又在於有些發展中國家生活成本低，工資等成本較具競爭力，他們的產品當然比較有優勢。一旦按照李卓人議員建議的做法，便等於要人為地大幅增加勞工成本，其後果只會大大削弱出口國的競爭條件，反而無助弱勢國家脫貧，賺取外匯，可能是“好心做壞事”。相反，原議案提倡開放市場，消除有問題的貿易手法，使各國在自由貿易中發展本身的優勢行業，工人的工資反而可能因為經濟發展得以調升。

主席女士，中國於去年恢復世貿的席位，其經濟實力及潛力正須有發揮空間，而香港則一向主權自由貿易經濟。所以，我謹代表工業總會和自由黨，希望特區政府在國際論壇上，多些宣揚支持廢除貿易障礙，維持公平法則，努力促進自由貿易。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修正案。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一直備受社會的關注，而在國與國之間的層面，這個問題更令人擔憂。究竟情況有多嚴重，相信以下的數字可以給予我們一點啟示。現時全球有超過 12 億的人每天以低於 1 美元或 7.8 港元維持生計；超過 8 億的人要面對長期的飢餓，無法過着健康及正常的生活。

雖然一些先進及富裕的國家，間中也有向一些貧窮的國家或地區提供援助，但成效有限，而且亦只能提供短期的紓緩；長遠而言，倚靠外來的援助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事實證明，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會助長國際關係中的不穩定的因素，影響全球的發展。

發展中國家必須透過發展自己的經濟，才能脫離對其他國家的依賴，而發展貿易也是重要的起步點。香港的發展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只要把握所擁有的優勢，即使是缺乏天然資源，也可以發展起來。在先進科技的推動下，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是大勢所趨。如果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夠把握機會，參與全球經濟的發展，可望藉此改善人民生活的條件。

當然，這只說明事實的一半。很多先進國家，藉着全球經濟一體化，一方面鼓吹自由貿易，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卻受到自己國內的政治因素所影響，採取一些保護的措施來保護國內的市場，因此造成極不公平的現象，令發展中的國家處於更不利的情況。

在農業方面，很多國家包括美國、歐盟等都有對本身的農業提供大量的補貼，令本身已經缺乏競爭能力的發展中國家農產品更無法立足於國際市場。更令人擔憂的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本身亦受到這些先進國家農產品的沖擊而進一步萎縮，令它們更依賴由外國進口糧食。

至於在其他的產品方面，不少先進國家也採用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包括條件苛刻的技術標準、複雜的健康與環境衛生檢疫、內容和手續繁雜的商品包裝和標籤規定、進口許可證等制度，令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很難打進發達國家的市場。貧窮國家既不能從出口賺取外匯，但又要用僅有的外匯換取糧食及必需品，令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嚴重。

雖然貿易涉及國際間很多利益及政治上的考慮，但香港作為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也應該在適當的國際會議及討論上，盡力倡議自由貿易，支持廢除一些與自由貿易不相符的貿易保護政策及手法。

主席女士，現時一些國際性的問題，例如恐怖活動、國際非法移民、人口販賣及毒品問題，都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息息相關。如果世界真的要實現經濟一體化，所有國家及地區共享發展的成果，那麼，國家之間必須遵守自由貿易的原則，而不是像現在那樣，“講一套，做一套”。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李家祥議員**（譯文）：主席女士，貿易是連繫世界各國的其中一股最強大的力量。這強大的連繫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不過，毫無疑問，貿易的一種特徵是，在貿易興旺的同時，世界各個角落的貧富懸殊情況會隨之加劇。世界上數以百萬計的貧民遭忽視，無法分享在創造財富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諷刺之處，原來要治癒貿易所帶來的疾病，貿易本身又是一條良方。貿易具有強大的動力，推動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更有助紓緩當地的貧窮問題。不

過，這種正面的潛力卻在各國的政治角力中消失殆盡，最終總是只有較強大及富裕的勢力獲益。因此，問題並不在於國際貿易本質上罔顧貧困的人的需要及利益；而是在於規管國際貿易的規定受到操控，偏幫富有的人，在在顯示富裕大國所採取的雙重標準及偽善。

香港現時是世界上一個重要的經濟體系，一直從國際貿易取得好處。香港也是一個世界城市，更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不少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因此，香港顯然不能置身度外，必須負上道義責任，確保全球貿易制度能令所有國家獲益，特別是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弱勢社羣也能獲益。

發展中國家理應分享國際貿易的利益，但不公平的貿易規定卻剝奪了它們這項權利。根據樂施會的數字，在 1988 至 1993 年期間，屬世界上最貧窮 5% 的國家損失了接近四分之一的實際收入；同期，屬最富裕 5% 的國家的收入則上升了 12%。已發展國家所架設的貿易障礙如關稅、配額及補貼等，限制了發展中經濟體系開拓市場的機會，並且令這些國家每年損失 1,000 億美元，相等於這些國家所獲得的對外援助金額的兩倍。在農業方面，歐洲聯盟及美國向當地農民提供的農業補貼高達每天 10 億美元，引致破壞環境及生產過剩等問題出現，全球農產品價格亦因而下降。這些農產品之後便會傾銷至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沖擊小本農戶及工人的生計。

正如我在發言之初時所說，規管全球貿易制度的規定大多並不公平。這些規定急須作出改變；而全球貿易制度亦急須進行改革。舉例來說，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就知識產權、投資及服務所訂立的一些規定，保障富裕國家及跨國大公司的利益，但卻要發展中國家付出高昂的代價。這種具傾向性的取態，不禁令人懷疑世貿的正統地位。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所鼓吹的自由貿易策略更為發展中國家設限，令這些國家無法決定開放本身市場的步伐及範圍，並妨礙當地政府引入必需的減貧政策。

一些人可能認為這問題與香港無關，因為香港政府一向倡議及奉行自由貿易政策，而本港的經濟也是在自由放任政策下茁壯成長。然而，我強烈反對這些意見。已發展國家減少或廢除貿易障礙，對本港及內地的經濟均有裨益。樂施會的數字顯示，如果已發展國家全面開放進口市場，內地生產商的營業額每年預計會增加 30 億美元。如果發展中國家能開拓更多市場，香港的商人將會獲益，而內地及地區的投資機會將會增加。此外，職位數目也得以上升，消費者可享有更多選擇，產品價格下降。本港那些與貿易相關的行業亦可獲益，因為行業前景會更為明朗。此外，本港周邊的經濟體系也可發展為香港公司的市場。

香港是世界上第十大貿易體系，所以我們應關注全球貿易規定是否公平這問題。我認為政府應在世貿、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及其他國際、地區及國家層面的場合上，運用本身的影響力，支持以自由貿易作為消除全球貧窮及不平等問題的工具。政府亦應在採取立場前，先行評估國際貿易協議對本港就業及貧窮問題的影響。陳智思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在本會辯論，我深表感謝。主席女士，我支持這項議案，並且深信立法會肩負社會責任，促請政府支持全球可持續發展，並參與改革全球貿易制度，在共同接受的公義價值及原則上，為全球一體化塑造一個各國均可融入的新模式。

主席女士，很可惜，石禮謙議員不能出席今天的會議，他這篇演辭，實在令我叨光不少。不過，既然我與他對這問題深有同感，我實在很樂意與本會同事及政府當局分享我跟他的一致意見。謝謝。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自由貿易與全球化是一個無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在過去 50 年，世界貿易總額增加了二十倍，達到將近 7 萬億美元；另一方面，國際社會關於自由貿易與全球化的爭論也一直存在，在近期甚至出現一股反全球化運動，在一些代表現時國際經濟貿易秩序與建制的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等舉行會議的時候，反全球化的抗議示威往往成為傳媒和輿論的焦點。

反對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全球化新經濟秩序的論據不一而足，世貿在其網頁就羅列了一些針對這新經濟秩序的反對意見，例如認為它只照顧跨國大企業的利益，無視勞工權益及環境保護，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以及激化不平等與貧富兩極化。無論這些論據的出發點如何，我們看到它們只是指出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國際秩序中仍有未盡完善之處，但並不能抹煞其為世界創造財富的積極作用，以及作為最終改善國際社會不公平經濟狀況的途徑。閉關鎖國、終止自由貿易並無助於改善國際社會間的貧富分化。要抗拒全球化的趨勢，讓世界重回“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顯然是不可取又是不可能的。因此，國際社會應有的共識，不是取消全球化與自由貿易，而是如何讓這個國際秩序推向更公平與公正，更顧及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更重視整體社會的發展平衡。

這項工作當然談何容易。每個國家都保障自身利益，即使在竭力鼓吹自由貿易的西方發達國家，這個口號也不過是被利用作向外擴張其經濟強勢，一旦自由貿易威脅到其國內產業，它們也同樣地築起貿易壁壘。以近期的美國為例，它就以其他國家以低於成本傾銷為藉口，單方面對進口鋼材徵收最高達 30% 的關稅，為期 3 年；而美國國會也通過法案，在未來 10 年為美國的

農產品提供高達 1,735 億美元的補貼。事實上，歐盟對農產品的補貼更高，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字，單在 1999 年，歐盟為其農產品提供了 1,145 億美元的補貼，相等於其農業生產總值的 49%。這些情況在在顯示出發達國家在自由貿易口號下的虛偽與雙重標準。毫無疑問，在發達國家政府高額補貼之下最受打擊的，是依賴這些傳統產業的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

現時國際貿易秩序不公平的狀況，還在於發達國家處於主導的強勢，它們往往能夠在貿易談判與磋商中更為主動，提出更多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也由於這種強勢，它們往往能夠無視國際貿易的協議與規範，敢於單方面採取增加關稅、補貼和其他限制進口的措施。類似世貿的仲裁機制，往往需要經年累月才能就一項貿易爭端得出仲裁結果，屆時，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支柱行業或企業可能已經被拖垮，即使採取報復措施也無濟於事。與此同時，最熟悉運用世貿遊戲規則的當然是這些發達國家。相反地，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往往在知識或資源方面欠缺而未能爭取公平的待遇。

在現時的國際貿易秩序中，國家利益為先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任何美麗的口號，好像“開放市場”、“保護環境”、“維護勞工權益”等，都往往被用作爭取自身利益及政客贏取其選票的幌子。相比之下，香港處於一個特別的位置，因為它一直奉行無條件的對外開放政策，因此一直以來在所有的貿易談判中都缺乏有力的談判籌碼，也沒有扮演重要角色。作為一個自由貿易的真正典範，香港未來應該在國際論壇與貿易談判中盡力推動真正公平公義的自由貿易秩序，同時也應該在談判中對本身的利益多加認真考慮，尤其是針對未來世貿有關服務性貿易的談判，因為服務業是香港的支柱行業，根據世貿的資料，2001 年香港的商業服務出口總值達到 430 億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九。所以，我認為政府在各類國際貿易談判和協定方面的策略與進展，應當向立法會的相關事務委員會作出更多的匯報與介紹，同時，政府也須加強注視其他貿易夥伴是否有履行其國際貿易協定下的責任，為香港的企業爭取國際貿易的公平待遇與市場的商機。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立法會今天辯論貿易政策，不過，實際上它並不單純是一個商貿問題，而是本議會對全球經濟一體化何去何從的表態，原議案和修正案便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爭論中的縮影——自由貿易、開放市場與貧窮及不平等的關係，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我並不是經濟問題的專家，對全球化問題亦缺乏深入的研究，面對鋪天蓋地有關全球化論述，我只能以有限的資料和常識，回應今次議案帶出來的問題。



對於自由貿易、開放市場這些經常被人掛在口邊，看來一片正面的詞彙，我是充滿疑惑；面對如原議案要求政府在國際層面上強調自由貿易，以開放市場來紓緩全球貧窮及不平等問題，我的疑惑便更大了。上星期，國際上一間著名的研究機構公布了最新自由貿易地區和國家的排行榜，香港 6 度蟬聯全球最自由的貿易地區首位，這是非常好的消息。然而，去年統計處發表的人口普查報告，卻反映出香港的貧富懸殊正急劇惡化，社會的不平等問題正越趨嚴重。

從全球的層面來說，無論是貿易自由或市場開放，在冷戰結束後都突飛猛進，不過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 1999 年年報指出，住在最富裕國家的五分之一世界人口，與住在最貧窮國家的五分之一世界人口，收入差距在 1960 年是 30:1、1990 年是 60:1、1997 年是 74:1。世界銀行 2001 年的報告說，全球超過半數人口每天靠不足兩美元過活，未來情況還會惡化。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說明了我疑惑的原因，我們的市場，是自由、開放度不足而引起貧富懸殊，還是自由、開放度過足，引發了越趨嚴重的貧窮及不平等問題；以致貧窮與不平等，根本就不是貪婪的市場可以解決得了？

自由貿易、開放市場永遠不是單邊的，在全球化的問題上，我無法認同新自由主義者大市場、小政府的論調，在國力不均，經濟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鼓吹自由貿易、開放市場，政府的工作只是搞好營商環境，不論是從宏觀的全球的層面，還是微觀的社會內部來看，不是對弱勢一方帶來更多的不幸，便是在改善自身環境成效上大打折扣，這便是近年來反全球化運動風起雲湧其中一個原因。

主席女士，當大家不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要政府在國際層面呼籲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時，究竟我們希望得到甚麼樣的結果？在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口號下，應否有前設的條件，避免一個又一個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對財雄勢大的跨國企業在它們的家園如龍捲風般掠奪而束手無策？因此，修正案提出公平貿易的原則，便是要在國力不平衡的貿易中注入人文的因素，我認為這是該走的第一步。因此，我要求政府在國際層面上呼籲保障勞工權益，我全力支持。因此，我支持修正案。謝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作為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成員，香港是有責任促進全球貿易自由與開放。然而，單單推行貿易自由化，並不能確保全球經濟的均衡發展，以及令貧窮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尤其是當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科技及生產力等全都享有優勢時，全面開放市場可能令發展中國家無法抗衡及競爭，最終會好像李鳳英議員剛才所說的，只有一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只有富有的一方得益，拉闊全球貧富差距。

主席，全球貿易政策，應以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減少貧窮為目標。然而，正如議案所指，現時歐盟、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部分貿易手法，在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之餘，對其他國家構成損害。

以農業政策為例，根據樂施會一份報告指出，1999 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的農民，總共得到高達 3,610 億美元的補貼資助。只憑藉他們的先進技術及高生產力，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成本原已較低，再加上政府的龐大補貼，它們的農產品得以廉價進軍全球市場。

墨西哥於 1994 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後，從美國運來的平價粟米便充斥當地市場，至今當地粟米價格已下跌 48%，美國粟米佔據了四分之一市場。表面看來，粟米價格下跌對消費者有利，然而，不要忘記的是，當地農民收入因而大減，而在這些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往往是經濟命脈。

隨着中國加入世貿，內地市場將對外開放，令人憂慮的是，類似情況亦可能在內地出現，數以億計的農民的生計將備受打擊。

主席，去年，我曾經出席樂施會舉辦的“藥物專利戰”倡議活動，促請港府支持發展中國家要求以合理價錢購買藥物的行動。世貿的協議強調尊重知識產權，所有新發明產品，包括藥物皆可享有 20 年專利。有關協議令發展中國家無法複製必需藥物，但它們同時亦沒有能力購買正版藥物，而正版與仿製藥物，價錢可以相差達四十倍之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2000 年全球有 1 100 萬人死於傳染病，當中大部分來自發展中國家，單是非洲便有 200 萬人死於愛滋病。發展中國家是傳染病的重災區，諷刺的是它們卻無力負擔昂貴的藥物，國民生命備受威脅。主席，我認為在人命關天的前提下，世貿及西方藥廠不應只執着於知識產權，而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較廉價藥物，又或輸出技術，協助它們生產藥物。

全球貿易自由化是大勢所趨，然而，世貿在推動市場開放之餘，亦不能忽略發展中國家的權益。陳智思議員建議打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不正當貿易手法，令後者能夠在一個較公平的基礎上進行競爭。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在世貿協議內加入保障基本勞工權利的條款，主席，對於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我原則上亦是支持的，不過，我想補充的是，勞工問題如低工資及童工等，在發展中國家是實在的問題，事實上亦較為嚴重，勞工權益所以受到漠視，有時候並不是基於蓄意被剝削，而可能是貧困和現實使然。因此，主席，我擔心如果純粹因為違反國際勞工公約條文而對貧窮國家再作制裁的話，最終受苦的只會是當地的人民。

總括而言，主席，我認為貿易自由化應該是多贏的，發達國家應該向窮國提供更多技術或金錢援助，並撤銷關稅等貿易限制，只有這樣，那些貧困人民才能真真正正享受到開放市場的成果。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民主黨贊成自由貿易，亦支持政府繼續在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中，致力促進各成員國進一步落實貿易自由化，逐步取消關稅及配額等歧視性貿易手法。這一點不單止會對中國及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對香港亦同樣有利。

綜觀全世界，能真正做到貿易自由化的地方是寥寥可數的，香港是其中一個。香港採取零關稅政策，亦沒有實施任何配額，外國產品可自由進口。正因如此，我們認為當香港與外地進行貿易磋商時，便往往缺乏談判籌碼。隨着區域主義的興起，世界各地由建立多邊貿易關係大多數轉為建議雙邊貿易關係或成立區域性的貿易組織。香港要爭取本身的利益，確保利益不會被損害，將會面臨更大的困難。

此外，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緊密，隨着內地加入世貿，相信會有更多港商到內地投資生產，歐美國家對內地實施的歧視性貿易手法最終亦會損害香港的利益。故此，民主黨促請政府繼續在國際論壇上致力促進自由貿易，同時要求歐盟、美國及其他已發展經濟體系取消各項歧視性貿易手法。

主席，香港雖應該繼續支持自由貿易，但國際趨勢卻並非如此，過去 10 年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例如歐洲聯盟的成立，美國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即使中國亦計劃在將來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在這個新的形勢下，過去一直提倡多邊自由貿易的國家，例如日本、新加坡等，亦已經與其他國家展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為免令香港的長遠利益受損，政府便有必要制訂正確的政策。日後政府在促進多邊貿易體系的同時，亦應對過往的貿易政策作出適當的檢討。簡單而言，政府過去的貿易政策採取積極不干項的政策。政府一方面向全球同樣開放，另一方面亦不會介入港商在外地所遇到的糾紛，政府只擔當球證的角色。十分明顯，以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而言，政府再不能夠滿足於擔當這個球證的角色；政府不單止要主動地跟外地政府進行貿易談判，爭取港商的經營空間，亦應該更積極地為港商爭取利益。例如美國駐外地的領事館一向都會維護美國商人在外地的利益，而香港的外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卻只會為港商提供資訊性資料或寫報告等。因此，政府有需要作出這方面的改變。

此外，政府最近也分別與新西蘭及內地商談雙邊貿易協議，這是一個好開始。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進一步研究如何與亞洲其他地區，例如台灣及馬來西亞等有很多華人聚居的地方，加強雙邊的貿易投資關係及促進更緊密的經濟聯繫。不過，政府這方面的工作似乎非常緩慢，例如與新西蘭商討自由貿易區，至今已為時兩年，仍未有任何新進展。董建華先生在 2001 年年底宣布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中港自由貿易區的建議，以便取得更緊密的聯繫關係，梁錦松司長亦多次表示正積極進行有關這方面的工作，但到今天，仍只聞樓梯響，未有任何實質進展。民主黨要求董建華政府在未來兩年達成這項協議，以作為其中一項施政目標。

最後，我想就修正案作出簡單的回應。原議案及修正案分別提出要強調開放市場及公平貿易對紓緩全球的貧窮及不平等問題的重要性。民主黨認為開放市場及公平貿易兩者之間並無衝突，不過，開放市場本身似乎並不足以紓緩全球的貧窮及不平等問題。公平貿易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所以民主黨認為修正案比起原議案更理想。修正案要求在貿易協議內加入保障基本勞工權利的條款，在某程度上是促進公平貿易的其中一項措施，民主黨對此亦表示支持。

修正案最後一點，要求政府在出席有關會議前作出充分諮詢，民主黨是同意有關做法的。事實上，除了會議前須作出充分諮詢外，在會議後，政府亦應該更詳細地交代有關會議內容及結果。例如民主黨過去一直要求政府在出席世貿有關促進公平競爭的工作小組後，提供相關資料及各成員國對香港提出的意見。其實，在國際間，亦有不少國際組織批評香港在維護公平競爭上是不理想的。隨着政府更多參與雙邊貿易談判，談判內容及結果將更直接地影響本地不同界別人士的利益，政府必須確保有關談判的透明度及市民的知情權。我謹此陳辭，支持李卓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貿易自古以來已經存在，世界各地透過貿易，互通有無，帶來經濟效益。在現今全球化的環境下，貿易為不少國家帶來好處，例如近年南韓透過出口，為國家帶來可觀的收入。貿易的增加，也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人均收入相繼提高。試看香港，雖然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但無可否認，過去連續十多年或戰後的發展，令香港這一代的生活較以前為好，透過經濟活動，令工作職位增加，生活得以改善。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貿易卻可能令人民受到很大的沖擊，尤其是當那些國家的政府加入國際性的貿易組織後，問題更為嚴峻。我們一方面看到貿易帶來好處，但另一方面，貿易也會令第三世界受到沖擊。事實上，即使是最發達國家，那裏的工人也可能受到沖擊。

國際性貿易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世貿”），要求各國的貿易準則一致化、標準化，而且是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來釐定。可是，各國國情不一樣，發展中國家一旦加入這些組織，便要依從它們的準則，不能按本身的國情，實施合情合理、保障國民生活的政策。

或許有人會說，發展中國家可以不加入世界性的貿易組織，但事實上它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們國家加入世貿，朱總理便說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痛苦的一面。在過程中，可以看到不參加是不可能的，但參加後會帶來很多影響。舉例來說，國內很多人擔心，當國家加入世貿後，會對國內的工業、農業造成重大的沖擊。不過，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們的國家也要加入世貿。

事實上，有些國家是不能不參加的。在某程度上，可說是在一些大國的威迫利誘下，被迫參與開放市場。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詳細說明。

加入國際性貿易組織，小農和工人的生活最受影響。剛才有不少同事談及農民，我也談一談他們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大部分倚賴農業為生，一家人只靠幾畝瘦田，以種主糧為主。由於耕種技術落後，加上天災人禍，收成不多且不穩定，收入僅夠一家糊口。如果收成好的話，才可將多出來的糧食賣錢，購買日用品和供子女讀書。

發展中國家大多會對農業、農產品進行補貼，以保障農民的生活。但是，國際性貿易組織高舉所謂“公平”原則，要求發展中國家取消補貼，令本來生活已經困難的小農的收入更欠保障。

發達國家卻持雙重標準，透過多種途徑補貼本國的農產品，例如在研究、信貸等方面提供補助。它們的農產品在大規模生產下，本已較小農生產便宜，在政府的補貼下更便宜，出口到發展中國家，沖擊當地的農產品價格。落後國家的小農無法靠出售農產品換錢，無法負擔子女上學，沒有知識，不能解決貧窮問題。這些國家的貧窮可說會一代一代延續下去。

對於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贊同的。我認為國際貿易規則應加入保障勞工基本權益的條款。現時世貿的規則只是限制由囚犯製造的貨品入口，其他保障工人權益的規則卻完全沒有提及。

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有“血汗工場”，童工及女工更是最弱勢的一羣，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工資低、沒有休息時間、沒有任何權益保障。以剝削工人而惡名昭彰的跨國企業，有迪士尼、麥當勞、製衣生產線等。他們的政府往往因為經濟理由，對工人及童工的苦況視若無睹，又或沒有能力作出

改善。我們看到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對這些跨國公司都很反感。由於這些公司對他們作出無數的損害，迫使他們起來行動，反對這些跨國公司的無理剝削。

正如我發言開首時所說，貿易本應為人類帶來更好的生活，但如果貿易制度不公平，便會適得其反，令人民的生活更困苦。如果想扭轉這種貿易不公平的情況，香港市民、香港政府是有一定的角色的。市民可以“出聲”，要求他們日常愛用的產品的生產商給予工人應有的權益。香港政府可以做的，是在國際性的場合提出保障農民生計、工人權益的訴求，要求改革現時不公平的國際貿易準則，並呼籲其他國家支持，以公平的貿易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大家都能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目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秀蘭議員：**主席，今天大家在談公平貿易，我必須對公平這兩個字，先作解釋。

例如現時兩個人有一塊蛋糕，其中一人獨吃了那塊蛋糕，另外的一個便沒得吃，這當然是不公平。將一塊蛋糕切為兩塊，一人一塊，那是否公平呢？未必的，因為一塊可以很大，另一塊可以很小的。那麼，將一塊蛋糕切為兩塊同樣大小重量的，再分給兩人，又是否公平呢？也未必，因為其中一人可能是嬰孩，無須吃那麼多，另一個人卻可能是全日體力勞動的成年人。所以，當我們說自由搏擊時，真的要看看參與的兩個人是否四肢健全才可以說公平的，若其中一人只有一隻手、一隻腳，當然便強弱立見，如此的兩人作自由搏擊，自然無甚麼公平可言。故此，我們說公平貿易之餘，其實亦必須因應不同國家、不同的發展程度，來看看以不同進度來開放市場，對有關國家會有甚麼影響。

主席，現時主導世界貿易的國際組織，主要有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世界銀行（“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其中世貿聲稱自己是民主架構，以共識解決問題，其他的就推給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銀和國際貨幣基金會表面上的工作是借錢給發展中國家，協助這些國家發展經濟，但事實上，卻同時威迫利誘發展中國家向它們借錢，還要這些國家履行“結構性調整計劃”。

所謂“結構性調整計劃”，其實就是向借貸國家施加借貸條件。這些條件，通常都包括緊縮財政開支，減少政府公共開支，最終導致這些國家削減

社會福利，另一方面則強迫它們馬上開放市場，於是最得益的便是跨國企業，但那些國家本土的勞工，其實只獲得將農業或其他一些家庭式工業的勞動轉向一些流水作業、分工的勞動，他們的生活實質上得到多少改善呢？在一些沒有民主的國家，情況更差，很容易變成了本地官與外地商勾結，於是這些國家的貿易數字可見有很多增長，但勞工方面卻只獲得花生這般小的報酬，生活無多大的改進。

處於最低層的農民、工人等，會最首當其衝，而女工更容易成為炮灰。在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裏，重男輕女的觀念依然非常偏重，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亦較少，於是一些低技術、勞動密集的工作，便主要由女童工擔任。這些工作，本來薪酬就較低，僱用條件亦較差。當外國的跨國企業將生產線帶到這些第三國家時，很多時候，這些女童工便會成為最慘的犧牲者。

1993 年，深圳一間為意大利玩具公司製造玩具的致麗玩具廠發生大火，我相信本會內很多勞工界的議員也會對該事件存有很深刻的記憶。當時，工人被困在一個封閉、鐵籠似的宿舍，門窗都上了鎖，很多女工逃生無門，慘遭燒死，即使是生還者也帶着嚴重的殘疾，至今還未完全獲得合理的補償，而同類的工廠，現時在世界上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第三世界的地方裏，其實依然存在，依然在運作中。

在政府的層面，第三國家面對龐大債項，往往只能以債減債，就好像香港人以“信用卡叻信用卡”一樣。即使支付了本金，依然有很多利息要償還。例如很多非洲國家，現在還要向日本償還很多利息。其實，有國際的人道組織指出，如果全世界所有的軍隊放假 10 天（所有當軍人的一定會很開心了），則這 10 天的軍費，已足以支持全世界的兒童獲得基本的免費教育。

我們當然非常歡迎這些全球化的運動，而主導國際性全球化貿易的組織，在開放市場之餘，有否想想要做一些工夫令世界各地的兒童受惠？這些組織在執行一些結構性調整計劃或其他條件時，可以從中得到富裕國家的一些優惠，讓這些第三國家可以減少外債，然後令它們的兒童真的有機會站起來。其實，現時有很多資金，是可以為很多人提供清潔的食水，為很多兒童提供教育，為很多人提供醫療保健的，但我們且看看現在國際貿易的趨勢，可見數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非但無法解決貧窮的問題，反而加深了有關國家裏的貧富懸殊，亦加深了不同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

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呢？剛才也有議員說過，香港可以做的其實不多，但最少我們有責任到海外出席國際貿易會議前，先徵詢本地民間團體、勞工組織、人道組織，看看有甚麼底線是我們一定不可以超越的。我亦想指出，國

際現時有一個趨勢，就是一些人道的組織會發起對全球性消費行為的杯葛，只要看到有哪些跨國企業，若是過分的跨境破壞別人的環境，跨境剝削別人時，便會發起杯葛行動，我相信新的局長在製衣行業裏具十足經驗，對這樣的情況是非常清楚的；結果是現時有些美國的製衣公司也不敢再放肆地僱用童工了。

主席，國際貿易把人變成消費者，但有良知的消費者亦有方法連結起來，發出杯葛的。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陳智思議員，你現在可就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發言。

**陳智思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為議案引進了若干新內容。特別是他要求政府促進國際勞工權利，以及在出席貿易談判前諮詢港人及香港團體。這兩項意念都很有趣。

我樂於認同與勞工相關的問題，對第三世界經濟體系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我亦時常贊成政府官員聽取社會的意見及建議。不過，有別於為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這個較直截了當的問題，這些內容可能相當複雜。我們也許值得在另一個場合更充分地予以辯論。

跟一些我們在這裏見過的議案不同，原議案所要求的，是實際上可以做到的事。因此，我懇請議員表決支持原議案。

謝謝。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多謝陳智思議員今天提出議案，以及李卓人議員提出修正案。我亦很多謝在座多位議員發言。

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貿易是一個極受關注的問題，亦是香港經濟的主要命脈。我很高興在特區政府剛進入第二個五年時，有機會闡明政府在國際貿易上的目標和立場。



香港是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系。香港本地的天然資源近乎無，但一直以來，實行自由開放的貿易政策，對貨物入口採取零關稅，並開放絕大部分的服務市場，積極參與全球貿易，使香港得以在短短數十年間，成為國際貿易中心和區內相對上富裕的城市。雖然最近一兩年全球經濟放緩，但香港去年的貿易額仍達 35,600 億元，是本地生產總值的二點八倍。香港要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生存，並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必須發揮本身的優勢，推動本地的貨物和服務出口，開拓更多新的國際市場，並藉着香港在轉口貿易上累積多年的經驗，進一步鞏固香港在國際貿易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無論在多邊或區域性的貿易組織和論壇中，例如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香港的立場一向都是清晰和堅定的，一方面，我們全力推動進一步的全面市場開放，使香港和其他地方出口的產品能夠行銷更多市場；另一方面，香港主張制訂公平和合理的國際貿易規則，使所有經濟體系，包括香港在內，能以本身相對上的優勢，在國際市場上公平競爭，從全球貿易增長上獲益。

香港堅定支持開放、公平和自由貿易，除了是因為我們本身是依賴國際貿易而成功的典型例子外，還有大量數據和研究證明，貿易開放的程度和經濟的持續增長有密切的關係。過去 50 年，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下，即世貿前身，進行了 8 輪多邊貿易談判，促使國際貿易增長高達十五倍，全球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此外，亦有學術研究指出，當一個經濟體系把其貿易和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提高 1 個百分點，便可以使人均收入提高 0.5 至 2 個百分點。因此，我們深信自由貿易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基石。

香港一向都是多邊貿易制度的擁護者，而這制度建基於世貿的一套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上。世貿成立於 1995 年，取代 1947 年訂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香港是世貿的創始會員，在 1997 年回歸祖國後，以“中國香港”的單獨成員身份繼續參與世貿的活動。世貿的規則除了涵蓋貨品貿易外，還對服務貿易和保護知識產權作出一系列的規範。這些規則旨在確保國際貿易活動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進行。世貿亦有一套貿易糾紛調解和仲裁機制，旨在為貿易爭端尋求積極的解決方法，並有助遏止貿易強國單方面採取歧視性的貿易行動。因此，在世貿下的多邊貿易體系，對發展中經濟體系、缺乏政治力量的國家，以及細小的世貿成員，例如香港等，是非常重要的。

世貿的規則雖然包含了過去全球貿易自由化進展和成果，但直至目前為止，貿易壁壘依然存在，因為所有國家在每一輪的貿易談判中，也會以自身的經濟利益作為主要考慮，往往未能充分顧及全球整體經濟和貧窮國家的發展需要。農業和紡織業正好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在過去五六十年的國際貿易談判歷史中，農業和紡織業一直是相當敏感和棘手的議題，一方面，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非常倚重這兩個行業，因為發展中國家擁有大量勞動人口，能夠以低成本的優勢，在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以賺取外匯，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令本地經濟得以增長發展，解決貧窮問題；但另一方面，已發展國家傳統上對這兩個行業也採取了眾多的貿易保護措施。因此，要開放這兩個市場，已發展國家須面對來自本土極大的政治壓力，絕對不能輕言開放。

在農業方面，已發展國家一直以來對農產品作出大量補貼，剛才陳智思議員已經提供了一系列的數字。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調查，其成員每年所發放的農業津貼達 3,000 億美元，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出口的兩倍。此外，為防止廉價的農產品由發展中國家大量出口，大部分已發展國家都對農產品徵收極高的關稅或採取關稅率限額等措施。雖然香港本身並沒有農產品出口，但香港仍然從整體公平自由貿易的經濟理念着眼，支持在可行的政治現實下，逐步廢除所有農產品貿易的保護措施，使各國最終能夠在農產品市場上公平競爭，而貧窮國家亦能以本身在農業方面的優勢，增加生產和貿易，帶動社會發展。

紡織業是香港很熟悉的行業。一直以來，香港在成衣和紡織品出口方面都擁有相當的優勢。現時，成衣及紡織業仍然是本港出口值最高、僱用人數最多的製造業。長久以來，已發展國家在成衣及紡織業方面，對發展中國家採取了很多歧視性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多種纖維協定下的配額限制。多年來，香港和其他受影響的經濟體系從雙邊和多邊等渠道，努力爭取廢除有關措施，令紡織業可以融入正常的多邊貿易體制。在經過 8 年艱辛的烏拉圭回合談判，香港和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系成功爭取在世貿的框架下訂立《紡織及成衣協定》，成為紡織品市場開放的里程碑。根據該項協定，所有紡織品配額都會在 10 年內分 3 階段取消。此外，香港是國際紡織及成衣局的成員之一，透過各成員之間的合作，向那些實行保護措施的國家施加壓力，防範新保護措施的出現，並對《紡織及成衣協定》的落實過程進行討論和提出建議。在 2005 年，紡織品配額全部取消後，紡織品貿易能夠在較為公平的台階上進行，使發展中國家能發揮所長，從紡織品貿易增長中獲益。

現在，我想就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作出回應。在貿易和勞工權利方面，長久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已發展國家試圖於貿易協議引入與勞工標準有關的制裁條款，十分抗拒。那些條款普遍被發展中國家視為貿易歧視手段，目的是剝奪貧窮發展中國家透過發展勞動力密集的工業和服務貿易，從而改善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機會。亦由於這原因，發展中國家一直強烈反對在世貿中討論引入與勞工標準有關的條文。由於世貿的決策建基於全體成員所達成的共識，所以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在討論有關問題時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香港一向重視勞工權益，積極參與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事實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已經加入了該類組織，例如 ILO，並致力透過制訂合適的勞工政策，逐步改善勞工權益。

為了增強相互合作，世貿秘書處一直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國際勞工組織各級的會議，當中包括國際勞工組織的年會，以及從社會角度研究全球化的工作小組。此外，世貿和國際勞工組織秘書處亦保持溝通，並把本身成員的討論情況向對方反映。我們十分支持繼續這類工作，同時認為各國際組織在尋求加強合作時，亦必須集中處理本身工作範圍以內的事情，以免工作重疊和浪費資源。

就李卓人議員修正案的最後部分，我們一向認為政府在多邊貿易談判所採取的立場，必須建基於香港的整體經濟利益，而我們的工作成果亦應該對社會整體有利。為此，我們在開展貿易談判前，會諮詢業界、關注團體和公眾的意見。由於世貿會議非常繁多，而且議題一般須經反覆和長時間討論，才可以達成共識，因此，如果要在每一次會議前也諮詢業界、關注團體和公眾的意見，無論在技術上及實際運作上，都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證，在參與具決定性的重要會議前，我們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渠道，聽取業界、關注團體和公眾的意見，確保我們所參與的決定，最終符合本港的整體利益，並為市民所接受。

最後，我想藉着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們在國際貿易談判所扮演的角色。一如先前所說，我們深信自由貿易是持續經濟發展的基石，並以市場開放、公平貿易作為我們在國際貿易談判的立場。因此，前工商局、工業貿易署和香港駐日內瓦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同事，都很積極參與去年 11 月在多哈啟動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以期進一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這一輪談判與之前的談判不同，幾乎在每一個議題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要都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這一輪談判亦稱為“多哈發展議程”。香港支持世貿舉辦的技術性支援，使發展中國家能有效地參與多邊貿易體制，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會在談判中竭力尋求更多市場進入，即 **market access**，為香港的商人開拓更多商機，同時使發展中國家能透過參與國際貿易，增加生產，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減少貧窮。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消除所有貿易壁壘，能夠使全球收入增加 28,000 億美元，並且令 3 億人脫離貧窮。

在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中，香港將會繼續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的重要橋梁。在貨物貿易方面，特別在紡織業，我們和其他發展中世貿成員一樣，面對着很多已發展國家的歧視性貿易措施，因此，我們和其他發展中世貿成員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在服務貿易方面，由於服務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80% 以上，所以我們在談判桌上積極爭取開放更多服務業，而這種立場與已發展世貿成員較為相近。由於這些緣故，香港能夠充分瞭解到兩大陣營

的看法，並經過我們過去的努力，建立起一個公正和具建設性的形象，使小小的香港能在兩大陣營中擔當很重要的橋梁角色。

主席女士，我希望以上的發言，能夠讓議員知道香港在國際貿易上的目標和立場。我們知道自由貿易不是解決貧窮的萬應靈藥，但貿易對增加就業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雖然我們在自由貿易上已經取得某程度上的成果，但我們仍須時刻防範保護主義的抬頭，並須維持貿易談判的動力，繼續為建立一個完整、有活力和持久的多邊貿易體系而努力。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卓人議員就陳智思議員的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卓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李卓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麥國風議員及葉國謙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霍震霆議員、張宇人議員及劉炳章議員反對。

李家祥議員及陳智思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黃成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贊成。

黃宏發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吳亮星議員及馬逢國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9 人出席，6 人贊成，11 人反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6 人贊成，2 人反對，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陳智思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陳智思議員**(譯文)：主席女士，感謝各位同事連續第二天回到這個議事廳，而我尤其要感謝就這個複雜的議題與我們分享了見解的 10 位議員。

我動議這項議案，並非為了在本會不同組別之間製造矛盾，因此，這項議案的目的是簡單而不過分的。這項議案只是促請政府道出已發展國家所採取的所謂雙重標準，阻止第三世界的生產商進入它們的市場。

香港主張自由貿易，而我們又往往是言行一致。因此，香港絕對可跟其他很多地方一起，就這個問題表達意見。

剝奪發展中的經濟體系自由進入市場，將會拖慢那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對於這些發展中國家的較貧窮人口來說，代價尤其沉重。受到最大沖擊的，將會是農民、紡織工人及工廠工人。然而，我們最終得全部付出代價。較富裕國家的消費者及納稅人將會受害，而全世界也得承受貧窮的結果，包括政局動盪及較疲弱的營商環境。

我提出這項議案，目的是要做到不具爭議性、合乎實際及可以實現。我並無妄想香港可影響美國、歐洲聯盟或日本的貿易政策。然而，這項議案可為簡單而合理的求變要求增添一點力量。讓本會各黨各派的同事聯合起來，促請政府這樣做。

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智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 議員舉手 )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 沒有議員舉手 )

涂謹申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涂謹申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張宇人議員、葉國謙議員及劉炳章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李鳳英議員及麥國風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余若薇議員、吳亮星議員、劉漢銓議員及馬逢國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黃成智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5 人贊成，5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0 人贊成，10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 下次會議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2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正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4 時 16 分休會。